



长篇反腐小说



高和

著

线装书局

[长篇反腐小说]

前门



高和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门 / 高和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2.11

ISBN 978-7-5120-0748-2

I. ①前…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4664号

前门

著 者: 高 和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 李 萌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09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0册

定 价: 39.80元



目 录

缘 起 /001

第一章 有上级担责任的事情就放手去干 /009

彭远大这时候还不明白，人家为什么挂着专案组组长、副组长的名头对这个案子一点也不感兴趣。侦破盗窃案是出力不讨好的累活、苦活，像这种出力不讨好的累活、苦活，也只有交给彭远大这样的生手，或者老牛那样实在没案子可办的人。

第二章 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050

现今社会当干部，只要不贪不色，老老实实工作，就是好人，就有权利渴望提拔升职。有了机会，又有条件，当面向组织说说自己的愿望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第三章 跑官就像在商场上做生意 /105

彭远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尽早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硬着头皮去找了局长，他没有直接说自己想当科长，那个时候的人脸皮还没有现在的人厚，即便跑官也是躲躲闪闪、迂回出击，不像现在的人，把跑官看得就像在商场上做生意，就像在房地产市场作投资。

第四章 给对手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余地 /161

吴修治对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但是他却没有对夏伯虎全盘说出来，这倒不是他有意隐瞒什么，而是长期从政养成的习惯，什么话都不说透彻、说绝对，一定留有充分的余地，就像现在，你说他对这件事情不知道吧，他又知道，你说他知道吧，他又好像并不了解详细情况，这样他就有了转圜和随机应变的充足空间，避免被堵在死角里没办法转身。

第五章 阴错阳差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遇 /209

蒋卫生的不屑可以理解，对于彭远大这样一个以工代干进入人民警察队伍，手头还有一个案子破了个稀里糊涂没结果的人来说，在局长、刑侦组长和众多经验丰富的老警察面前评价人家现场勘探水平，给人的印象就是夸夸其谈、班门弄斧。

第六章 竞争是一时的，共事是长期的 /278

每一个领导的述职述廉报告都是一篇先进事迹总结，似乎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都是廉洁奉公的模范、品学兼优的人才。过去常说追悼会上没坏人，批评会上没好人，现在应该再加一条：述职会上出人才。

第七章 领导一出手，就要有大动静 /373

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就要有大动静，能够敏锐地分析判断出当前的关键矛盾，并且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环境和局势，这才是一个高级干部应该具备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真正的权威。

结 局 /437



缘起

当一群野猪出现在银州市偏远山区农民的田里饱餐红薯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银州市的官场会让这一群野猪给搅得暗潮涌动、波澜起伏，以至于险些影响到银州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银州市公安局范局长既不贪财又不好色，唯一的嗜好是打猎。近年来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各省也相应出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条例，这样一来，除了老鼠几乎就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可以供局长猎杀了。范局长只好按规定将那把心爱的克虏伯牌双筒猎枪缴到公安局的枪库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动物和公安局局长都过起了太平日子。

银州市的山区有野猪，野猪的繁殖率高，日子太平了野猪就拼命寻欢作乐，寻欢作乐之后就大量繁殖，于是食物发生短缺，野猪就开始向山外扩张，把农田当成了餐桌。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高粱、红薯、山药蛋等作物成了野猪的美餐。野猪这畜生缺德之处就在于它不光吃，还能祸害，一亩地的庄稼它吃三分糟蹋七分，这就更让农民愤怒。农民决定对野猪宣战，在地里扎稻草人、鸣放鞭炮、敲锣打鼓，用这些办法来恐吓、驱赶野猪。刚开始野猪还有几分惧怕，后来逐渐看透了人的伎俩，发现



人虽然不是黔驴，却也有技穷的时候，人来了不但不再逃跑，居然反过来龇牙咧嘴吓唬人。

农民们决心大开杀戒，给野猪点颜色看看。可是，打猎是犯法的，即便不犯法也没有武器，猎枪都被集中到了公安局的枪库里，要狩猎必须得到林业局、公安局、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机关的审核批准，然后才能由拥有狩猎专业证书的猎手到公安局领取猎枪，在公安局的统一组织指挥下按照有关部门核准的数量、品种猎杀。

为了能够消除猪患，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农民们就到市委市政府状告野猪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要求党和政府为民做主。市委市政府对农民的利益不敢怠慢，更怕农民集体上访事态扩大，连忙组织有关部门商量对策。

有关方面认真学习了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省政府颁发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又核对了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条目，确定野猪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在省里也只被列为一般性的保护动物，从而认定本市范围内的野猪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生态指标，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猎杀十头成年野猪。于是银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给公安局下达了任务：尽快猎杀十头野猪，震慑嚣张至极的野猪，还农民一个公道，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范局长接到命令，大喜过望，压抑多年的狩猎欲望有如青春期的躁动一样令他踊跃勃发。他立刻组织成立了狩猎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狩猎领导小组组长。很快，十来个人的狩猎队组织起来了，局长又任命自己为狩猎队队长，猎枪也发到了每个狩猎队员的手里。局长抚摸着阔别多年的双筒猎枪，那份亲热和激动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

狩猎队成立后进行了安全、法律等方面的短暂培训，然后便迅速出动，朝野猪出没的山区进发。

范局长全副武装，穿着粗帆布猎装，戴着太阳牌遮阳帽，踩着适合登山越野的翻毛皮靴，扛着他那只心爱的克虏伯双筒猎枪，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的潜意识里，这次狩猎活动就像经过上级批准因而合理合法、光明正大的一次公费旅游。狩猎队员们也都非常轻松，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对付几头抢食农民粮食的野猪，就像一次度假中预定的娱乐项目。

经过一天跋涉，狩猎队来到了野猪活动的龙山区南山外坡。在农民的农舍中休息一夜之后，狩猎活动正式开始。局长作了分工，狩猎队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三个人。每个组都配有一台对讲机可以随时保持联络。局长负责指挥调度，跟一位老猎手两个人算是机动小组。

局长这么分工有点私心，分配的各个组都有规定的方向、区域，不能超越规定的范围搜索、捕杀，这既是为了保证猎手的安全，避免相互之间误伤，也是为了保护野猪不要遭受过量的捕杀。而机动小组没有区域、范围的限制，活动空间自由度更大，所以获取猎物的概率也就更高。

局长是富有经验的猎手，这次狩猎活动又安排得非常周密严谨，按说应该是万无一失，捷报可期。但是，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那么古怪，越是觉得危险、艰难的事儿，办起来却往往顺利、平安。越是觉得容易、轻松的事儿，办起来往往会出现意外甚至灾难。就像汽车行驶在崎岖难行的道路上不会出事故，行驶在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反而常常车毁人亡。

局长跟老猎手钻进林子，很快就发现了野猪的踪迹，根据踪迹他们



判断这是一家五口，两口大猪三只小猪。这次狩猎专门规定，不能打小野猪和母野猪，只能打大公猪。野猪和人一样，成年雄性的生存风险都更大一些。

很快他们就跟上了这一家五口，野猪们也很快发现了他们两个人。野猪已经跟农民斗痞了，不但不怕人，反过来向人发威。猪爸爸是一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大的壮汉，长长的獠牙龇在猪嘴的两侧，发现了局长跟老猎手之后，反过身来堵住了野猪踩踏出来的野路，龇牙咧嘴，喉咙里发出挑衅的低吼，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掩护妻子女撤离。

范局长问老猎手：“你先来？”

老猎手当然不能跟局长争先，谦让道：“局长先来，第一枪第一口猪，讨个好彩头。”

局长此时已经技痒难耐，也不再跟老猎手客气，端枪瞄准，轻扣扳机，“嘭”的一声巨响，枪口冒出一缕淡淡的青烟，张牙舞爪的公野猪应声倒地，母猪跟小猪见人跟它们玩真格的了，急忙落荒而逃。局长急于上前收获自己的猎物，老猎手拉了他一把：“局长，还蹬腿呢。”

局长对于自己的枪法极为自信，加上一出手就猎到了野猪这样的大猎物，心情特爽，讪笑着说：“话都不会说，什么叫局长还蹬腿呢！打一头猪用两颗子弹，也不怕人家笑话。”说着便朝垂死挣扎的野猪走了过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端着枪做随时射击的准备，而是非常潇洒地把枪横担在肩上，他觉得打倒的不过是一头野猪，既不是狼，更不是老虎、豹子那些食肉猛兽，所以心里根本没有紧张、恐惧的感觉。

局长走到野猪跟前，野猪却突然翻身扑了过来，呲着獠牙发疯地朝

他发起了攻击。受伤的野猪面对敌人发作起来比豹子还要凶猛，比亡命徒还敢拼命。情急慌乱之中局长顺手抡起猎枪朝野猪的脑袋上砸去，枪托重重地砸在野猪脑壳上，不知道是振动太大，还是局长忙乱中碰到了扳机，枪走火了，双筒猎枪里剩下的那颗子弹从他的下颌射入，炸开了他的脑袋……

公安局局长突然死亡，立刻成了震动银州市的特大新闻。这位范局长是个好人，不贪不色，唯一的嗜好就是打猎，却为此付出了生命。银州市准备追认局长为烈士，报告立马打了上去。上级经过认真审核，认为局长在狩猎的过程中有明显瑕疵，比如说，这次狩猎他作为一个地级市的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不应该为了满足个人嗜好而亲自加入到狩猎队里。在猎杀野猪的过程中，过于轻敌大意，处置危机时举止失当，结果酿成惨祸。因为有这些瑕疵，上级没有批准追认局长为烈士，只同意定性为因公殉职。

好局长为民献身却不能当烈士，让市委市政府遗憾，如果局长当了烈士，银州市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局长生前的种种感人事迹，说不定还能组织宣讲团进京，让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都知道银州市出了这样一位因为民除害而英勇献身的好局长。遗憾归遗憾，不管有多少瑕疵，局长的死确实是为了让山区农民免受野猪的茶毒，确实是因公殉职，所以银州市为范局长举行了隆重的告别大会。

送走了局长，抚恤了局长的亲人，人们才发现事情并没有了结，反而更加复杂、更加麻烦了。首要的麻烦事就是谁来接班！局长死的时候年仅四十八岁，正是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年富力强、前程远大的好时光，不论是他自己还是组织上都没有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虽然组织部门捏着



一大把第二梯队的后备干部，可是第二梯队的后备干部太多，谁来接班就成了可以有多种答案的开放性选择题。

如今官场的总体格局就像计划经济时期的饭馆，每张饭桌跟前都会有一群人等座。前不久省里搞了一次创举，公开选拔二十个副厅局级领导，要求必须是正处级或者在副处级岗位熬到四年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报名，结果居然有四千三百多人报名竞争这二十个职位。这也难怪，如今当官的好处太大了：稳定而丰厚的薪水、便宜的和白送差不多的住房、由纳税人埋单的公家配车、吃喝玩乐全报销的豪华待遇等，官员绝对属于先天下之乐而乐的阶层，谁不想进入这个阶层呢？公安局局长这样的职务更是一个握有实权，令人垂涎三千丈的美差。

局长一死，银州市的官场立刻暗潮涌动，上下左右一起围攻，里里外外奇计百出，搅和得市长夏伯虎和书记吴修治上班怕进办公室，下班怕进家门，走在路上怕接手机。最让书记吴修治啼笑皆非的是市文联主席，一个五十八岁高龄的准退休老人居然也觊觎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仗着自己的亲家是省委主管干部人事的副书记，追到吴修治家里毛遂自荐。吴修治憋着一肚子气，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承诺，好不容易打发了这位唠唠叨叨的文联主席。第二天一上班便赶紧联络市长夏伯虎、人大主任曾聪明和组织部部长关原开会，他采取的是领导遇到难题时通常采用的办法：集体讨论，集体负责，有什么麻烦也好往集体身上推。这也难怪，吴修治已经五十八岁，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除非出现奇迹，被提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已经开始做退休的思想准备，现在最大的追求就是平平安安着陆，历史经验和现实总结都告诉他：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折腾的本钱了。他自然不愿意为一个公安局局长的职位问题而搅扰自己

好不容易才回归宁静通达的心境，破坏自己多年营造的平衡和谐的外部环境，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把破解这道难题的责任交给了“集体”。

这次会晤当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很简单，四位领导对公安局局长的突然死亡毫无思想准备，对局长死亡之后的激烈竞争也没有应急预案，所以谁也无法马上提出合适的人选来。即便谁心里有人选这种时候也不敢轻易端出来，这种时候最先端出来的人选不但会让人无端猜忌，往往最终也难以如愿。这种事情靠开会无法解决，会议只能确定方向和原则，会议只不过是会对会前桌下协商好了的具体问题履行最后认定的形式，就像签合同，事先谈好了才能签字盖章。经过对银州市干部队伍目前蠢蠢欲动、暗潮涌动的现实进行认真分析，四位对人事任命有决策权的领导总算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银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选就在公安局现有的副局级领导里选拔。这样做有利于缩小竞争范围，有利于公安工作的顺利衔接，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干部队伍的稳定。很快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大原则就被有意无意地从市府大院传播出去，文联主席之类的非公安系统的干部自动出局，官场总算消停了许多。

然而，这个大原则就像浓缩剂，把原来宽泛的竞争矛盾浓缩到了公安局这个小范围内，本来就已经不太平静的公安局这下子更加躁动不安起来。如果从公安局内部选择干部替补，根据职务和资历，有四个选手最具有夺冠实力：公安局政委、副局长，分管政治处、纪检监察、警务监督以及工青妇组织的蒋卫生；分管分局和出入境管理以及户籍、内保、警卫工作的副局长姚开放；分管刑侦、禁毒和治安的副局长、号称局长大人的彭远大；分管后勤装备和培训工作的副局长庄扬。这几个人年龄都在四十六七八岁，分管的工作分量都很重，在那个级别再上一个台阶



都还够杠。这四个人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弱点，各有各的势力，也各有各的对头。到了这个份儿上，竞争就进入了白热化，几位选手各显神通，明里暗里的开始铆劲儿，好像谁都可能成为局长，又好像谁都有点悬乎。

副手中有一个提升正职，必然会出现一个副职的空缺，这又勾引得那些处长、主任、队长蠢蠢欲动、焦躁不安，公安局就像红油火锅，表面上平静如水，油层下面的温度早已过了沸点。

相比之下，局长竞争者中形势最为不利的就是那位号称局长大人的副局长彭远大，因为在这关键时刻，他却不在市里。半个月前他带着刑警队的大李子和黄小龙千里迢迢远赴福建调查一桩长达二十多年的重大积案，后来又深入到闽南山区追捕重点嫌疑人，那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所以至今他连局长的死讯都不知道。刑警队的内务老牛摇头叹息：“唉，局长大人啊局长大人，都怪我，这么叫了你几十年，结果把你的那点福气叫薄了，什么时候出差不好，偏偏这个时候，看样子局长这个位子跟你这位局长大人无缘了。”局里许多人的看法都跟老牛相似，估计局长大人这一回没戏了，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怪他自己运气不好，不该在这个时候出差。

1

局长大人的“人”字应该读儿化、轻声，读出来就是：“局长大人儿”，由此可知，局长大人现在还不是局长，局长大人现在还只是老牛送给彭远大的绰号。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原来的公检法系统都被造反派搞乱了，公检法机关整顿，急需补充人员，大批选拔有文化的工人充实公检法司干警队伍。那个时候工人名义上还是领导阶级，工资加上保健、夜班费和各种津贴，收入比警察高得多，不像现在工人都是下岗后备军，所以那个时候当工人最光荣、最幸福，抽工人当警察还真没有几个爱去的。

彭远大刚刚入党，进入了先进分子行列，正好公安局扩编抽人，领导看他身体单薄，虽然各项工作积极，真正的重活也指望不上他，便派他充了个数，到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身份是以工代干。

刚当警察半年多，彭远大就声称，他的理想是当公安局局长。对于一个以工代干身份的小警察来说，这个理想是够远大了，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名副其实。“禽！”老牛当时就骂了这么一声，过后不屑地评论道：



“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他那个德行，高没有一撂，粗没有一把，还当局长呢，就这个代干能当下去就不错了。”从那以后老牛就把彭远大叫“局长大人儿”，明明是小矮个，却称之为“大人儿”，奚落、嘲弄的意味不言而喻。

老牛叫牛一群，人们都把他叫老牛，并不是因为他年龄老，而是因为他长得老。他的长相自来旧，据他自己说，他一出生就满脸皱纹，他爸当时就质问她妈：别人生出来的都是儿子，你怎么生出来个爷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皱纹也在增长，二十岁的时候就有人喊他老大爷，现在他也才三十岁，就有小孩叫他老爷爷了。

老牛对彭远大的评价比较符合实际，彭远大名字很有气势，人长得却一点儿也没有气势，穿上厚底大皮靴个头也就是一米六五，瘦得满身骨头，说他“高没有一撂”、“粗没有一把”有点夸张，却也非常形象。女人这种体态可以说成“小巧玲珑”、“娇柔轻盈”。男人这种体格就没有正面的形容词可用，而这种体格的男人如果再把他的远大理想说出来，比如彭远大当众宣称想当局长，就有点像屎壳郎推着粪球上公路，自以为又有轱辘又有壳便算小轿车，显得荒唐又滑稽。

想当公安局局长的野心是彭远大破了公共女澡堂的失窃案之后，精神极度亢奋时不经意暴露出来的。市里最大的公共澡堂叫东方红浴池，有一段时间连续发生女澡堂衣服丢失的案子。那时候的人穷，好看点的衣服就是了不得的财产，丢了衣服的女人们就找警察报案，那时候盗窃案的立案标准是二十五块，也就是说丢失的财物价值二十五块以上就得立案侦破。

女澡堂失窃案本来是由老牛主办的。老牛照例走群众路线，调查研

究，分别谈话。谈话时对每个人都详细询问，甚至要追问每个洗澡的人脱去衣服后的体貌特征。调查对象都是女人，听到他问女同志不穿衣服的样子，就觉得这个警察有点流氓，怀疑他动机不纯，冷眉冷脸的不跟他合作，于是老牛的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忙了几个月，不但一无所获，公安局局长的小姨子到澡堂洗澡的时候又丢了一块梅花牌进口手表。

案子从丢失几件衣服升级到了丢手表，案子的性质也由一般性的盗窃案升级到了重大盗窃案。丢手表的还是局长的小姨子，这就让老牛非常狼狈。丢了衣服的革命群众见公安局迟迟不能破案骂警察是草包废物，丢了手表的小姨子当面质询姐夫公安局是干什么吃的，搞得公安局很没面子。局长把女澡堂专案组叫去狠狠骂了一通，当即决定改组女澡堂专案组，老牛灰溜溜地从专案组调出来，彭远大精神振奋又有些忐忑不安地进了专案组。

那个时候公安局刚刚整顿重组，机构设置还没有后来处啊、队啊、科啊、股啊那么多名堂，除了有一个局办、党办之外，其他机构不管级别不论规模一律叫组：刑侦组、治安组、技术组、户籍组、政工组、人事组……此外，有什么案子需要侦破还要成立个专案组，所以那个时候“组”特别多。既然要破女澡堂的失窃案，自然也就设了个女澡堂专案组。

女澡堂专案组一共三个人，老牛出来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组长蒋卫生，一个是副组长姚破旧，彭远大接到命令就去找蒋卫生报到。蒋卫生现任公安局党组办公室的副主任，挂着女澡堂专案组的组长，还兼着另一个杀人案的专案组副组长，工作重心在党办和杀人案上，非常忙碌，对女澡堂这种案子也就是挂个名，其实根本就顾不上过问。彭远大过去跟他不太熟，一直搞不清蒋卫生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绰号。



不管是名字还是绰号，都名不副实，蒋卫生其实一点儿也不卫生。下巴颏儿像年代久远的鞋刷子，上面的胡茬子参差不齐，眼角常年积累着一团眼屎，头发从来不接触梳子，整理头发全靠五根手指头，指甲盖的缝隙里黑黝黝的都是污垢。那个时候的上下级关系没有现在这么清晰，“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大民主”、“官大官小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等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还没有清除，所以彭远大这样的小兵也敢跟蒋组长开玩笑，见了面彭远大先解惑：“蒋组长，蒋卫生是你的名字还是你的绰号？”

蒋卫生拉长脸说：“当然是名字，我没绰号。”

彭远大忍不住笑了，蒋卫生非常耐心地解释：“没什么可笑的，名字是老师起的，我们那儿农村的小孩生出来都不起带姓氏的名字，一直到上学报名的时候才由老师给起个正式的名字，所以带姓氏的名字就叫学名。我上学的时候正好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老师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跟现在起的那些卫东、东方、文革、立新一回事儿，就是个称呼。姚副组长不是就叫破旧吗？就是“破旧立新”前面那两个字。好了，不说这些了，老牛把案卷交给你了吗？”

说到了正经事彭远大不敢再嬉皮笑脸，连忙一本正经地回答：“给了，我已经看过了。”卷宗彭远大已经熬夜认真看过一遍，依老牛的分析判断，那天在现场的人谁都像小偷，却谁都不太可能是小偷。

“有什么想法？”

彭远大说：“暂时还没有具体的想法，还是得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蒋卫生咧咧嘴：“老牛的群众路线走得还少吗？少说空话虚话，破